

# 数智新时代的语言认同与文化认同<sup>\*</sup>

张璟玮

**提要** 新的时代有新的文化形态。本文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数智时代的技术对新时代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影响。在数字时代，数字通信可以增强用户既有的语言和文化认同；社交媒体则是少数群体表达隐性认同的平台，也是多语、多元文化认同者实现跨语言、跨文化认同的平台。进入智能时代，群体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意识将进一步增强，世界语言强弱格局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可能重构。本文提出三条建议：第一，加强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教育；第二，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我国境内语言和方言的机器互译能力；第三，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承载功能。这些举措将有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多元一体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

**关键词**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数智时代 语言认同 文化认同

## Language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New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ZHANG Jingwei

**Abstract**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inaugurated by the Fourth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marks a new epoch. In this transformative period, it is crucial for the humanities to consciously examine the humanistic issues arising from technological advance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echnology’s impact from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its influence on language identity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Digital Era,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edia have profoundly influenced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By transcending the constraints in terms of time and space, digital communication helps mobile populations maintain connections with their original communitie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ir existing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Social media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self-express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communities, allows minority groups to express implicit identities, and enables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individuals to achieve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cultural identities.

Looking ahead to the Intelligent Er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ill further enhance productivity. This productivity increase will create conditions and possibilities for people to pursue their needs for belonging, thereby reinforcing group consciousness of

---

<sup>\*</sup> 本文系国家语委重大委托项目“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学科建设研究”(ZDA145-7)的阶段性成果。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closely monitor implicit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emerging in cyberspace and to strengthen cultural identity education , particularly regarding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and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Intelligent Era ,the global dynamics of language strength will be reorganized. The status of dominant and minority languages will depend on their digital resources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capabilities. Thus ,this article suggests that as China develops its own large language models ,it is crucial to focus on improving transl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on one hand ,and regional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n the other hand , ensuring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maintains a dominant force by enhancing its centripetal and cohesive power domestically and its intermediary and connective power internationally.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ll have a distinct impact on human civilization compared to the previous three ,challenging the Enlightenment’ s assertion that human reason is the most crucial element of consciousness. This shift will ultimately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aradigm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will reshap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ulture. It was previously believed that Putonghua ,as a standardized language regulated above dialects ,is not the natural mother tongue of the people. Consequently ,Putonghua’ s role in carrying ,transmitting ,and preserv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as considered weaker than that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inority languages. However ,standardized languages are better suited for communication with machines. Therefore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standardized languages will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ir roles in carrying ,transmitting ,and preserving culture in cyberspace. These languages will become the primary vehicles for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words**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language identity ,cultural identity

## 1. 引言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 2023)发出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指示,要求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语言文字工作者应积极响应号召,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承担时代责任,思考语言认同与文化认同在新时代的新发展。

伴随着新时代的科技进步与社会变革,人类迈向“数智时代”新纪元。“数智时代”是数字时代和智能时代的合称。在数智时代,语言的使用范围从单一的社会空间拓展到社会、信息、物理三个空间(李宇明 2021)。这一拓展模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打破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界、促进了新型人际关系的形成,从而改变了社会结构。这一过程显著地影响了语言本身以及以语言为主要载体的文化。

面对数智时代技术创新给语言和文化带来的深刻影响(第2节),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探索:数智时代技术创新会对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产生什么影响(第3-4节)?基于这一研究结果,本文第5节为新时代我国的语言文化政

策提出建议，为加强全国各族人民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的认同建言献策，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 2. 理论基础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人类已经进入了由数字技术支撑的数字时代。本节首先综述数字时代语言和文化的变化，进而讨论数字时代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变化，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

### 2.1 数字时代语言和文化的变化

数字时代语言和文化的变化首先可以通过数字空间中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来观察。Kelly-Holmes(2019)将这一演变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单语言主义”(monolingualism)、“多语言主义”(multilingualism)、“超语言主义”(hyperlingualism)和“个人语言主义”(idiolingualism)。单语言主义出现在互联网发展的早期，当时网络语言以英语为主，非英语用户需要学习或将文本翻译成英语才能参与。这一阶段英语所承载的“美西方文化”迅速扩散到全球。随着技术进步，多语言主义出现，一些强势语言进入互联网，打破了英语的垄断。但此时的多语使用仍然受限，即各种语言保持隔离，用户基本按照地理位置分配到某种特定语言的网络环境中。本土强势文化也在网络中占有一席之地。超语言主义是指数字空间可以提供无限数量的语言。例如社交媒体鼓励用户以自己的语言贡献内容，弱势语言也得以进入互联网。个人语言主义是一个与超语言主义并行发展的阶段，具体是指人们在数字空间中根据自己的喜爱和偏好对语言学习、语言使用进行个性化定制，每个人在数字空间里的语言选择和使用都不完全相同。当前的主流是超语言主义和个人语言主义并行发展，弱势语言逐步融入数字时代。这有利于弱势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促进了多语言认同和多元文化认同的形成与传播。

数字时代文化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弱势文化得以用数字形式保存和传播，还表现在无论是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都在经历一系列深层次的变革。Levin和Mamluk(2021)总结了数字时代文化的三个新特征：精神文化的个性化、社会文化的透明化和技术文化的智能化。精神文化的个性化主要体现在内容的自由创造和在线身份的建构上。虚拟世界的活动成为个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个体的精神文化世界。社会文化的透明化则表现为社会互动的公开化、动态化以及公共意识的形成与发展。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观点，这些互动生成的大量在线信息促进了社会文化的透明化。技术文化的智能化则得益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技术的类人认知化发展将逐步成为人类认知的延伸。

## 2.2 数字时代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变化

数字时代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会受技术影响而变化吗? 认同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概念, 包括语言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宗教认同等等, 涵盖了个体或群体在多个方面的归属感。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群体共同创造的物质、制度以及精神文化的接纳与认可( 郑晓云 1992)。“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习近平 2021)。文化认同需要一定的载体, 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信仰等, 其中语言是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Dorian 1999: 31-33)。Gumperz( 1982) 认为个体的社会认同的建立通常基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差异, 这些差异是在交流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 语言塑造社会现实, 语言是认同的基础。Le Page 和 Tabouret-Keller( 1985) 进一步提出“语言行为即认同行为”的观点, 因为语言行为是在人际交往和群体互动中选择语码、语体、风格等的综合过程, 这些选择本身就是语言认同的体现, 可以反映讲话人的种族、群体和文化信仰等。因此, 语言认同是种族、群体、文化等方面认同的基础。语言认同能够反映文化认同, 语言认同的变化也会引发文化认同的变化。

至于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会不会受时代影响而变化, 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Eslami 等( 2023) 将变革时代对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影响归纳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 数字技术促进了跨语言、跨文化的适应, 推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认同趋同; 另一方面, 它也加强了少数群体对自身语言和文化认同的坚持, 有助于保持全球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然而, “趋同”和“多元”这两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立的, 反映出数字时代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复杂性。本文将着重剖析这种复杂性, 探究在什么条件下, 新技术会促进少数群体的语言和文化认同, 在什么条件下又会促进跨语言、跨文化的认同, 推进认同趋同。

## 3. 数字时代的经验

互联网技术是数字时代的核心技术。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 把握信息革命的“时”与“势”, 统筹推进网络强国的建设, 并强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 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习近平 2019a: 5)。有鉴于此, 我们首先深入总结互联网给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带来的影响, 从数字通信和社交媒体两方面来具体分析。数字通信的核心功能在于维持社交网络( Lewis 和 Fabos 2005), 社交媒体的核心功能则是用户发布和分享内容( Gündüz 2017)。两者功能的差异会对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产生不同影响, 3.1 节和 3.2 节分别讨论, 3.3 节为小结。

### 3.1 数字通信

数字通信具有实时、同步的特点, 有助于流动人口维系与原有言语社区和

文化群体的关系。学界一直关注留学生和移民如何利用数字通信来适应跨语言和跨文化环境的问题( Lim 和 Pham 2016; Gaitán-Aguilar 等 2022; Wong 和 Liu 2024)。研究发现,留学生或移民在出国初期通常面临语言障碍、身份质疑和文化适应等问题,数字通信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与原有社交网络的联系,获得情感支持,提升幸福感,减少孤独感,从而保持对原有语言和文化的认同。

数字通信强化了我国少数民族对本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认同。我国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社会文化发展要求(习近平 2019b)。微信、QQ 等数字通信软件帮助少数民族同胞将现实中的社交网络转移到线上,满足了维持社交网络和加强信息交流的需求,实现了散居同胞的“再社区化”,强化了他们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例如,微信的语音功能方便了蒙古族牧民与亲友之间的联系。对于许多文化程度不高的牧民来说,他们只需使用民族语言即可与散居在其他地区的亲友交流(李亘、许加彪 2021)。彝族村落有较强的乡党意识,留守在家乡的中老年人通过微信群加强联系,促进村寨内部的和谐发展,增强了民族认同。外出打工的彝族年轻人汉化程度较高,彝语和彝族文化面临失传风险。在村寨微信群中,大家互相分享彝语、彝族歌舞和节日的音频、视频及文章,并借助微信语音功能进行在线彝语教学,增强了年轻人对本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认同和传承(兰叶剑 2018)。类似地,在对维吾尔族(金玉萍、王婧 2014)、苗族(孙丽群 2020)、布依族(孙丽群 2020)和佤族(Liu 2015)的研究中也发现,数字通信增强了少数民族同胞对本民族语言 and 文化的认同,方便了社交和信息交流。

另外,数字通信也促进了我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粤式中文的使用。粤式中文是用粤方言写的书面语(田小琳 2021: 21),因使用粤方言特征词、港澳社区词和粤方言语法,贴近粤方言口语而与通用中文相区别。数字通信软件语音转文字的功能为粤式中文的输入提供了便利(Sandel 和 Qiu 2020)。Tsui(2020)通过实证调查和定量研究,发现香港年轻人比老年人在使用数字通信软件发送即时信息时更常使用粤式中文,而且本地认同感强的用户也更常使用粤式中文。张璟玮、马卉嘉(2024)在澳门的调查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港澳地区本地认同感强的群体会通过使用粤式中文这样的方言书面语来凸显自己的身份认同。

相较于前数字时代的模拟通信,数字通信在单位时间数据传输量、数据安全、稳定性和覆盖范围方面都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通过便捷的输入法和较低的通讯成本,数字通信不仅便利了一对一的交流,还增加了群体互动,有利于维护和强化用户既有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此处所讲的“既有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既包括对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汉语方言和文化的认同,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多元”的认同,也包括对代表“一体”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总的来说，数字通信对于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作用主要是对现实生活中既有认同的确认和加强，相较于社交媒体技术，它塑造认同的功能较弱。下文将探讨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塑造认同。

### 3.2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是 Web 2.0( 又称参与式网络或社交网络) 时代的产物。与 Web 1.0 时代相比，Web 2.0 的核心变化在于从静态网页和单向信息流动转向对用户生成内容的强调( Murugesan 2007) 。Web 2.0 时代社交媒体用户可以创建、编辑和发布内容，使信息流动变为双向甚至多向。相较于数字通信，社交媒体对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影响更为复杂和深远。

#### 3.2.1 社交媒体促进少数群体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

社交媒体催生了“网络语言”。网络语言是一种灵活、多样、创新的语言形式，适应了数字时代快速、多媒体化的沟通需求。选择使用网络语言往往代表独特的语言认同。Ilbury( 2020) 的研究发现，英国年轻白人男同性恋群体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美国英语的词汇和语音特征来塑造自己的形象。英国白人工人阶级女性则在 Instagram 上通过使用非标准拼写和表达，来彰显她们的性别和阶级身份( Ilbury 2022) 。约旦的年轻女性在“脸书”( Facebook) 上更倾向于使用带有阿拉伯语元素的英语借词，这不仅能将她们与美国人区分开来，还能让语言更具阿拉伯特色，从而表达她们对阿拉伯语言 and 文化的认同( Zibin 和 Al-Tkhayneh 2019) 。

在社交媒体上，那些在线下生活中较少使用或不再使用的书面语变得更加可见，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网络语言”。例如，在对埃及网络语言的研究中，Warschauer 等( 2007) 发现了一种阿拉伯语口语书写形式。在埃及，古典阿拉伯语具有很高的威望，广泛用于书籍、报纸、演讲等正式场合。相比之下，阿拉伯语口语只在非正式的口语环境中使用，很少作为书面语使用。作者调查了开罗年轻人在社交媒体上的语言选择，结果发现在线下生活中较少使用的阿拉伯语口语在网络上广泛使用，与英语并存。另外，卢森堡语书面语( Horner 和 Krummes 2011) 和突尼斯阿拉伯语( Tounsi，一种阿拉伯语方言)( McNeil 2022) 的情况也类似，均是社交媒体促进地方语言认同的例证。

#### 3.2.2 社交媒体促进跨语言、跨文化的认同

Kelly-Holmes( 2019) 认为当前互联网上的语言发展到个人语言主义和超语言主义并行的阶段。上文论述的社交媒体促进少数民族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的个案对应了超语言主义，即用户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贡献内容，文化方面可以促进“社会文化透明化”。社交媒体促进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认同，某种意义上得益于进一步向个人语言主义的发展，有益于“精神文化个性化”。

Domingo( 2016) 探讨了数字化环境中语言和身份研究的机遇与挑战。作者详细分析了菲律宾裔英国青少年在“油管”( YouTube) 上分享音乐视频的案例, 说明社交媒体可以为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用户间的互动提供便利, 进一步促进个体建立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认同。这些菲裔青年分享自己创作的包含菲律宾文化特征的说唱歌曲, 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用户的互动和讨论, 视频作者也以英语、菲律宾语、西班牙语等与留言观众互动, 这种新的社交方式帮助视频作者实现了跨国交流和身份构建。

Li 和 Zhu( 2021) 探讨了海外华人用户如何利用中文书写系统和社交媒体挑战主流语言意识形态和政策, 表达新的跨国主义观念, 并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对于海外华人来说, 汉字和中文书写系统在维持族裔身份和加强团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研究重点关注了脸书和油管等社交媒体如何成为海外华人语言创新和社会参与的重要平台, 这些平台上的汉语使用在新的跨国主义和中国形象的想象中扮演关键角色。

上述两个案例研究的是跨国移民在社交媒体上的语言实践。跨国移民群体通常具备双语或多语能力, 他们的语言资源成为交流和身份构建的重要工具。我国港澳居民也多具备双语或多语能力, 而且他们习惯使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 因而对港澳社交媒体的语言研究相对较多。Lee( 2014) 探讨了香港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的语言选择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的个案数据来自一名兼任英语教师的大三学生。他在其学生身份的社交账号上主要使用粤方言与朋友互动; 在其教师身份的社交账号上, 则使用英语与他的学生和同事互动。作为中国人, 他在参与中国内地在线论坛时选择使用普通话, 避免出现中英混用现象; 而在香港本地的在线论坛中, 则主要使用粤方言或混用粤方言与英语。由此可以看出香港年轻人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较为多元化。澳门的情况也类似, 年轻一代在社交媒体上通过繁体字和粤式中文表达本地认同, 也通过粤英、粤普转换来表达他们的多元语言认同( Chan 2015) 。港澳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语言选择受互动对象、社交平台和在线身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用户可以在不同平台上使用不同语言来构建多个身份。年轻一代通过多语和多身份的构建,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认同中寻找平衡, 从而促进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认同。沈家煊( 2017) 指出中西方存在两种不同的范畴观: 西方强调“甲乙分立才是两个范畴”, 中国强调“甲乙包含就有两个范畴”。中式范畴观映射到认同上来说, 就是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包含式的认同观, 例如接受“中国人”与“香港/澳门人”是包含而非分立关系,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同时也可以认同自己是“香港/澳门人”。社交媒体上多身份的构建, 促进了多元认同的表达, 而这种多元认同的表达在中式思维的统摄下, 可以促进包含式的多元认同的形成, 进

而促进认同的趋同。

### 3.3 小结

本节指出,数字通信和社交媒体都重塑了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模式。数字通信侧重维系线下生活中的社交网络,有利于强化用户既有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社交媒体则侧重用户的自我表达和虚拟社区的构建。社交媒体具有双重效应——既可以促进少数民族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也可以促进跨语言、跨文化的认同。社交媒体传播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相对而言是弱势的,其表达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受到限制,而社交媒体为它们提供了表达的新平台。也就是说,社交媒体是这些少数群体表达隐性认同的平台,为现实生活中弱势的、承压的语言文化认同提供公共表达的空间。

在数字时代,跨语言、跨文化认同的表达需要用户本身具备双语或多语能力<sup>①</sup>,比如菲裔青年会英语、菲律宾语和西班牙语,英语国家的海外华人通常拥有中英双语能力,港澳用户通常掌握粤方言、普通话和英语等。多语能力往往代表着多元的语言认同,也对应着多元的文化认同,社交媒体可以为这些多元认同提供多个在线身份来一一对应,促进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流。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交流往往是自发的,如何将它们转化为促进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力量,同样也需要主流价值观的引领和推动。对我国来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习近平 2021)。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我们要始终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增强我国各族群众乃至全球华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的认同,促进形成包含式的、多元一体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

## 4. 智能时代的展望

在数字时代,信息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为现实生活中既有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表达提供平台,使得现实生活中弱势或隐性的认同得以传播。智能时代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为核心,将进一步改变人们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基于数字时代的经验,本文认为主要影响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生产力的提升将进一步增强群体的语言认同意识和文化认同意识

在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完成自动化重复性任务、优化资源配置,从而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解放生产力。生产力的提升带来了物质基础的丰富,使得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进而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关注精神层面的需求,如归属的需求,这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Maslow 1943)。所谓“归属的需求”是个体希望归属于一个群体,成为其中一员,即产生认同。

3.1-3.2 节已经显示数字技术如何为人们提供新的平台来满足归属需求。

---

<sup>①</sup> 广义的“双语或多语能力”,也包括方言和通用语的情形,前者如粤方言,后者如普通话。



智能时代生产力的提升将进一步显化群体隐性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一方面,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使虚拟空间的互动更加真实和沉浸,提升了人们在虚拟空间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通过收集和分析海量用户数据,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建立个性化用户模型,使推荐系统能够全面理解用户需求,提供符合用户兴趣的内容,帮助人们更容易找到与自己认同的群体,进一步满足归属需求。

## 2) 世界语言强弱格局将重组,影响语言的工具认同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sup>②</sup>,同时又指出语言文字是文化和文明的基因和根脉(姚喜双 2020)。这一论述深刻地剖析了语言文字兼具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征,因而有必要分开论述人工智能技术对语言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影响。

语言的工具性主要指语言的交际功能。数智时代以前,一门语言交际功能的强弱由以这种语言为母语和外语的讲话人的数量共同决定(De Swaan 2001: 21)。进入智能时代,“人-人”对话模式被拓展为“人-机-人”模式。会话双方可以操不同的语言通过机器翻译实现沟通,机器介入人际交往的程度和准确度将由会话双方所操语言的数字资源共同决定,因为这些数字资源是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如 ChatGPT)训练数据的来源。因而在智能时代,一种语言的交际功能不再仅限于以该语言作为母语和外语的使用者数量,而应包括并越来越依赖于该语言的数字资源。

现有语言可用的数字资源分布不均,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不同语言的支持程度也不尽相同。Choudhury(2023)指出,英语、西班牙语、俄语和汉语等24种语言似乎有足够的资源来构建强大的大语言模型。另外,孟加拉语、斯瓦希里语和印度尼西亚语等28种语言拥有足够的文本语料库,可以从大语言模型的跨语言零样本能力(crosslingual zero-shot ability)中受益。然而,其余语言约占世界语言总数的99%,使用人口约15亿,目前的大语言模型几乎不能为它们提供什么帮助。

因此,在智能时代,无论是强势语言维持强势地位,还是弱势语言改变弱势命运,都需要走数字资源智能化的道路。一门强势语言如不重视数字资源智能化的开发,将不复强势。一门弱势语言如果有足够的数字资源并能与强势语言进行互译,就能够通过这门强势语言实现与更多语言的互译,其使用者对该语言的工具认同也将随之增长。一门强势语言能够连接的弱势语言越多,它作为中介和联络的能力就越强,其使用者对该语言的工具认同也将随之增强。

---

<sup>②</sup> 见习近平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伦敦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时的致辞,转引自《人民日报》10 月 23 日第 1 版杜尚泽等的报道《习近平出席全英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年会开幕式》。

### 3) 人类文明新形态将重构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影响语言的文化认同功能

人类自启蒙时代以来,一直相信理性知识的发展可以解决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因而,人类发起了以蒸汽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和社会的深刻变革。接着,电力和钢铁的发展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生产方式更加高效和规模化。随后,信息技术的崛起标志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来到,极大地改变了信息传递和交流的方式。

如今,我们正迈入以智能化和数字化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时代。基辛格等(2023: 58-60)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以及个体生活方式等带来的变革与以往几次革命不同。过去的创新被描述为实践的延伸——电影是移动的照片、电话是跨越空间的对话、汽车是快速移动的马车。但智能时代的创新不能被继续设想为已知事物的延伸,机器在网络空间的智能化挑战着启蒙运动认为人类理性是意识最重要因素的主张。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建构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将重构语言和文化的对应关系。过去认为,普通话是一种超方言的、经过人为规范的标准语,并非自然的母语。因此,普通话在承载、传递和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功能要弱于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黄行 2016)。然而,被人为规范过的语言将更适合与机器交流。规范化的语言由于其标准的语音、语法和词汇,更容易被计算机编码和处理,在与机器的交互中表现出更高的效率和准确率。因而,我们可以预见,在智能时代规范化的语言在网络空间中承载、传递和保存文化的功能会得到极大的提升,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载体。

## 5. 智能时代的政策建议

针对智能时代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可能发生的三点改变,本节提出相应的三条政策建议来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1) 以认同教育应对日渐增强的认同意识

展望智能时代,技术将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生产力的提升将提供条件,帮助人们满足归属需求,进而强化群体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意识。怎样将这种增强的认同意识引导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的认同,非常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根本途径”(习近平 2013)。以此为指导,本文建议应特别重视在网络空间,尤其是社交媒体上显化隐性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引领,加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教育,制作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中华文化相关的优质内容,通过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信息传播技术,实现主流价值观的精准传播和推送。

## 2) 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我国境内语言和方言的机器互译能力

在智能时代，世界语言的强弱格局也将重组。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的地位将取决于它们拥有的数字资源和机器翻译能力。我国正在自主开发大语言模型，如“文小言、讯飞星火”等。在开发大语言模型时，需格外重视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我国境内方言以及 139 种民族语言( Shearer 和 Sun 2017) 机器互译的能力。国外的大语言模型多以英语为中心，只训练英语与其他语言互译的数据。我国自主开发的大语言模型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中心，不仅关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境外语言的互译能力，更需要关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境内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互译能力的开发。这样才能够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智能时代对于本国语言的向心力、凝聚力以及对境外语言的中介力、联络力，保持其强势语言的地位。

机器翻译能力的提升除了依赖算法改进和算力提升，相关语言数据的采集和开发也至关重要，因为高质量的机器翻译需要大量的平行双语数据作为训练数据。因此，政府和学界都需要重视采集和开发我国境内的多语种数据资源，特别是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等边境少数民族语言。这不仅是一种用数字形式保存这些语言变体的手段，更可以帮助实现这些语言变体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间的高质量机器翻译，既有利于保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智能时代的强势地位，也有利于维护我国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实现双赢。

## 3) 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承载功能

在智能时代，人类文明发展新形态将重塑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新时代有新的文化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习近平 2023) 强调，用中华文化的智慧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数智时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高度契合。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以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为基础，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那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主要以什么语言表达、承载和传播？我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以担负这一使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非人造的语言文字，而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通用语言文字一脉相承，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智慧和情感，也是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基因和血脉。

在数智时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文化认同功能将在网络空间得到提升。通过智能技术的支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可以对中华文化进行创新表达，还能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助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 6. 总结

数智时代是第四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新的时代。在变革的时代，人文学科要

自觉审视科技所引发的人文问题。本文从语言学角度反思技术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技术对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数字时代,数字通信和社交媒体都对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数字通信通过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帮助流动人口维持与原有社区的联系,增强他们既有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社交媒体则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自我表达和构建虚拟社区的渠道,是少数群体表达隐性认同的平台,也是多语多文化认同者实现跨语言、跨文化认同的平台。对两者功能的区分和认识,有助于提醒我们,即便是利用社交媒体增进跨语言和跨文化的认同,也必须通过主流价值观的引领,才能进一步实现认同趋同。认同趋同也并非与原有认同对立,在中式“包含”范畴观下,可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包容性的、多元一体的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

在智能时代,技术解放生产力的同时,也为增强语言认同和文化认同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我们需要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流价值观驾驭‘算法’”(习近平 2019a: 7),驾驭智能技术,通过教育、社交媒体、数字资源建设和政策支持等多方面的努力,有效引导人们不断增强的认同意识,使它转化为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促进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 引用文献 [References]

- 黄行,2016,论中国民族语言认同 [Ethnic language identity in China]。《语言战略研究》第 1 期,25-32 页。
- 基辛格,亨利等著,胡利平、风君译,2023,《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The Age of AI and Our Human Future*]。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 金玉萍、王婧,2014,维吾尔族大学生新媒体使用与身份认同 [The usage of new media and identity of Uygur college students]。《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第 5 期,67-71 页。
- 兰叶剑,2018,微信群:民族村落的“再社区化”——基于一个彝族村的微信群观察 [WeChat group and “re-communitization” of ethnic villages: Based on observations from a Yi village WeChat group]。《新闻传播》第 3 期,21-23 页。
- 李亘、许加彪,2021,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文化嬗变的历史映射——从媒介环境学视角探讨蒙古族个案 [Historical mapping of media and cultural transmut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1 期,110-115 页。
- 李宇明,2021,语言与人类文明 [Language and human civilization]。《中国社会科学报》2 月 9 日第 1 版。
- 沈家煊,2017,从语言看中西方的范畴观 [The concept of categories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中国社会科学》第 7 期,131-143,207 页。
- 孙丽群,2020,少数民族家庭传播与民族文化传递——基于少数民族家庭微信群的研究 [Minority family 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 transmission: Based on the research of WeChat groups of ethnic minority families]。贵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田小琳编,2021,《全球华语语法·香港卷》[*Global Variation of Chinese Grammar, Hong Kong*]

- Volume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习近平, 2013, 在联合国“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一周年纪念活动上发表的视频贺词 [The video message delivered at the first anniversary ev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First” Global Initiative]。《人民日报》9月27日第3版。
- 习近平, 2019a, 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 [Accelerate the promotion of media integration and develop an all-media communication framework]。《求是》第6期, 4-8页。
- 习近平, 2019b,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The speech at the National Commendation Conference for Ethnic Unity and Progress]。《人民日报》9月28日第2版。
- 习近平, 2021,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Fully and accurately implement the new development philosophy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人民日报》3月6日第1版。
- 习近平, 2023,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Speech at the meeting 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求是》第17期, 4-11页。
- 姚喜双, 2020, 新时代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的根本指针 [The fundamental guideli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and script undertakings in the new era]。《中国教育报》10月14日第5版。
- 张璟玮、马卉嘉, 2024, 澳门粤式中文使用状况研究——兼论与香港的比较 [A study on written Cantonese in Macao: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ith Hong Kong]。《全球华语》第2期, 95-104页。
- 郑晓云, 1992, 《文化认同与文化变迁》[*Cultur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Change*]。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Chan, Brian Hok-Shing. 2015. A local voice of Macau: Traditional characters, code-switching and written Cantonese in an internet forum. *Global Chinese* 1, 2: 281-310.
- Choudhury, Monojit. 2023. Generative AI has a language problem. *Nature Human Behaviour* 7, 11: 1802-1803.
- De Swaan, Abram. 2001. *Words of the World: The Global Language System*. Cambridge: Polity.
- Domingo, Myrrh. 2016. Language and identity research in online environments: A multimodal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 In Siân Preece,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Pp.541-557.
- Dorian, Nacy C. 1999. Linguistic and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Joshua A. Fishman, ed., *Handbook of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5-41.
- Eslami, Zohreh R. et al. 2023. Identity, politeness and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a changing world. *Russi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7, 1: 7-38.
- Gaitán-Aguilar, Leonor et al. 2022. Social media use,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 longitudinal examination.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3.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2.1013375>.
- Gumperz, John J. 1982. *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ündüz, Uğur. 2017. The effect of social media 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Mediterran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8, 5: 85-92.
- Horner, Kristine and Cédric Krummes. 2011. Small languages in globalized spaces: Conflicting representations of Luxembourgish on YouTub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Language in the Media Conference, Limerick.
- Ilbury, Christian. 2020. “Sassy Queens”: Stylistic orthographic variation in Twitter and the enregisterment of AAVE.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4, 2: 245-264.
- Ilbury, Christian. 2022. U Ok Hun?: The digital commodification of white woman style.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6, 4: 483-504.
- Kelly-Holmes, Helen. 2019. Multilingualism and technology: A review of developments in digital communication from monolingualism to idiolingualism.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39, 24-39.
- Le Page, Robert Brock and Andrée Tabouret-Keller. 1985. *Acts of Identity: Creole-based Approaches to*

- Language and Ethni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e, Carmen. 2014. Language choice and self-presentation in social media: The cas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Hong Kong. In Philip Seargeant and Caroline Tagg, eds., *The Language of Social Media: Identity and Community on the Interne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p.91–111.
- Levin, Ilya and Dan Mamlok. 2021.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digital age. *Information* 12. <https://doi.org/10.3390/info12020068>.
- Lewis, Cynthia and Bettina Fabos. 2005. Instant messaging, literacies, and social identities.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40, 4: 470–501.
- Li, Wei and Hua Zhu. 2021. Soft power struggles: A diasporic perspective on the competing ideologies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regarding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5, 5: 737–753.
- Lim, Sun Sun and Becky Pham. 2016. ‘If you are a foreigner in a foreign country, you stick together’: Technologically-mediated communication and acculturation of migrant students. *New Media & Society* 18, 10: 2171–2188.
- Liu, Tzu-kai. 2015. Minority youth, mobile phones and language use: *Wa* migrant workers’ engagements with networked sociality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in urban China. *Asian Ethnicity* 16, 3: 334–352.
- Maslow, Abraham. 1943. Preface to motivation theory. *Psychosomatic Medicine* 5, 1: 85–92.
- McNeil, Karen. 2022. ‘We don’t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Language choice and identity on a Tunisian internet foru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78, 51–80.
- Murugesan, San. 2007. Understanding Web 2.0. *IT Professional* 9, 4: 34–41.
- Sandel, Todd L. and Peimin Qiu. 2020. Code switching and language gam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or convergence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n WeChat. In Patrick S. Dodge, ed., *Communication Converge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Platforms, and Participation*.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175–205.
- Shearer, Walter and Hongkai Sun. 2017. *An Encyclopedia of the 140 Languages of China: Speakers, Dialects, Linguistic Elements, Script and Distribution*.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 Tsui, Sze Ting. 2020. An emerging written vernacular: Increasing use of written Cantonese in Hong Kong in apparent and real time. MA thesi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Warschauer, Mark et al. 2007. Language choice online: Globalization and identity in Egypt. In Brenda Danet and Susan C. Herring, eds., *The Multilingual Internet: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Online*.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02–318.
- Wong, Melissa Ling Lee and Shuang Liu. 2024. The rol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 facilitating friendships and adaptation among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Malay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99. <https://doi.org/10.1016/j.ijintrel.2024.101942>.
- Zibin, Aseel and Khawlah M. Al-Tkhayneh. 2019. A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use of English loanwords inflected with Arabic morphemes as slang in Amman, Jord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60, 155–175.

#### 作者简介

张璟玮，女，博士，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社会语音学和语言规划。代表作：*A Sociophonetic Study on Tonal Variation of the Wúxī and Shànghǎi Dialects* 和“人口流动与普通话的普及”。电子邮件：jwzhang@um.edu.mo

ZHANG Jingwei, female, PhD,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Macau. Her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ociophonetics and language planning. Her major publications are *A Sociophonetic Study on Tonal Variation of the Wúxī and Shànghǎi Dialects* and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Putonghua (in Chinese).” E-mail: jwzhang@um.edu.mo